

浅析中国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困境及发展路径

郝艺

山西大学教育学系

摘要：我国必须不断推进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建设，以振兴教育，推进教育领域的改革开放，实现教育现代化。但当前中国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建设面临学科“身份危机”、建设方法失当、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等困境。因此，为破解中国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困境，我们应正确认识“身份危机”，重新树立学科自信；扎根中国教育实际，构建独特方法体系；加强研究队伍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探索学科的发展路径，促使中国比较教育学学科焕发出蓬勃生机。

关键词：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困境；发展路径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3.09.014

引言

比较教育学是现代教育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前沿性学科，是一门比较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规律和特点、借鉴有益经验，推动本国以及世界教育发展的学科。1929年，比较教育学专著《各国教育比较论》（作者庄泽宣）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初具雏形。此后，中国比较教育工作者在引入、吸收西方比较教育学理论与范式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社会和教育的发展现实与需求，努力探索中国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发展路径。^{1[1]}近年来，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学科“身份危机”、学科建设方法、学科人才培养等方面面临着困境。中国要振兴教育科学，促进教育领域的改革开放，实现教育现代化，就必须努力探寻破解比较教育学学科困境的有效路径。

一、比较教育学的内涵

1817年，法国教育家朱利安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与初步意见》中，首次提出了比较教育的概念，他认为比较教育“首先研究各国兴办教育和公共教育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全学程所包括的各种课程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每一目标所包括的公费小学、古典小学、高等技术学校和特殊学校的各衔接年级，然后研究教师给青少年学生进行讲授所采用的各种教学方法，他们对这些方法所逐步提出的各项改进意见以及或多或少所取得的成就”。^{2[2]}

我国比较教育学起步较晚，但我国的相关学者凭借持续不断的探索，不断明晰着比较教育学的定义。我国学者王承绪、顾明远等在其编著的《比较教育》中提出“比较教育是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当代外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找出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以作为改革本国教育的借鉴”。^{3[3]}杨汉清等学者综合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学科属性四个

要素，给比较教育学下了这样的定义：比较教育学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现行教育，以期发现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并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来改进本国教育的一门教育学科。^{4[4]}

二、中国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困境

（一）学科“身份危机”的困境

比较教育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817年，法国学者朱利安出版了《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一书。此后，各国学者较为一致地认同比较教育学的学科身份。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西方各种批判性思潮的鼓起，比较教育学的学科身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人们用“危机”来表征其所遭遇的困境。1993年，王英杰先生在《比较教育学定义问题浅议》中提出：“由于当前比较教育学界尚未对比较教育的定义取得一致的意见，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出现了所谓身份危机。”^{5[5]}此后，中国教育界对比较教育学学科的“身份危机”也展开了众多讨论。

目前，比较教育学学科面临的“身份危机”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术界一直在探讨比较教育学属于一门学科还是仅仅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存在。法国学者黎成魁、美国学者阿尔特巴赫都认为比较教育学是一个研究领域，而美国学者康德尔则认为比较教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对此，我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指出，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说得清楚比较教育到底是一个研究领域还是一门学科。第二，比较教育研究的领域过于宏大，几乎涵盖了教育学所有的研究命题，失去了作为一个专业学科该有专一和明确的研究对象，且没有自身专有的研究方法作为方法论基础。我国学者王英杰就分析“比较教育研究的领域过于宽泛，其边界过于模糊；比较教育缺乏自己特殊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要向

其他更成熟的学科借用；教育各分支学科现在都从事比较研究，从而挤压了比较教育生存的空间，甚至产生了对比较教育存在的必要性的质疑”。^{6[6]}第三，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范围存在争论，加剧了该学科的“身份危机”。王承绪、顾明远等学者将比较教育的研究范围限定为国外，而方彤、杨汉清等则将研究范围扩大为世界，成有信将研究范围定为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

（二）学科建设方法的困境

研究方法的运用是一门学科建设的关键。在我国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进程中，多采用书斋式文献研究的方法，即多是在对国外文献单纯翻译和介绍后，总说对我国教育改革有什么启示、借鉴意义，很少采用观察、调查、访谈等实证研究方法。且在借鉴别国的教育经验时，习惯于直接套用到我国的教育事实中，不考虑是否真的适用于我国的教育境遇。由此，我国借鉴的方法实质上是单纯的翻译介绍，而非深入研究，呈现出“拿来即用”的倾向。

长期以来，我国比较教育学在学科建设方面常常采取肤浅的“比附”方式，一直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张东荪提出“比较以见其相异更为重要”的观点，“因为不从同上着眼，而从异上着眼，是看一个思想的整个配合与系统。”^{7[7]}即“比较”是以整合的方法，顾及到整个系统和情境，最终找出两个或多个事物的共同点和差异。而“比附”是通过一个事物说明、解释另一个事物，没有从整个体系来看待问题，只是一味地寻求共同点。因此，通过“比附”获得的信息是教育现象的简单组合，对我国和国外教育的相异之处并未深入思考。

（三）学科人才培养的困境

当前我国从事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但人员构成复杂，从比较教育学学科内的研究人员、一线教育工作者、教育部门的行政人员到教育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人员，都可作为本学科建设的参与者。由此，我国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建设被无关人员所“侵袭”，整个队伍更像是一个“大杂烩”，参与本学科建设的门槛低、专业性薄弱。

比较教育学学科的人才素质构成，不仅需要具备深厚的专业理论素养，更需要具备充分的实践研究经验。而我国不少比较教育学者的学科背景并非与比较教育学科相关，对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不够深，外语翻译能力也有待提高，只能理解最浅显的字面含义而忽视文化语境。此外，我国比较教育学学者缺乏实践研究经验，部分学者仅凭对书面资料的理解进行判断，并不了解研

究对象国实施某种教育政策或进行某种教育改革的实际情况。

比较教育的国际性决定了该学科的建设需开展跨国家、跨文化的国际对话，这意味着应培养国际化的比较教育学科人才。当前我国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队伍缺乏国际化视野，相关人才的培养规格与国际标准之间也相脱节。而比较教育的可比性、实践性要求该学科的建设需要深刻了解本国的教育现实与问题，这意味着应培养本土化的比较教育学科人才。但目前我国缺少谙熟我国的社会与文化，确切知晓我国的教育需求，能真正为我国教育服务的学科人才。

三、中国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发展路径

（一）正确认识“身份危机”，重新树立学科自信

唯有正视比较教育学学科所存在的种种“身份危机”，才能促进该学科的建设。首先，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者应认识到危机是常态，当学科的知识不能解决现存的问题时，危机便会随之而来，因而任何学科都有可能陷入“身份危机”。况且比较教育学作为人类学科体系中的一个年轻且尚未完全成熟的学科，必定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不可避免地面临“身份危机”。其次，对于“身份危机”，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者应加以辩证地看待。危机对事物的发展并不全是消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具有积极影响，因为危机意味着不满足于现状而寻求改变，可为事物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就比较教育学而言，随着其学科建设者逐步反思学科的缺陷、不断追求学科的成熟，学科的“身份危机”才愈发明显。

在面对“身份危机”时，我国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建设者还需重新评估学科的优势，明确学科的本体所在，重塑学科的信心。首先，我国的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功用性强，研究领域庞杂，学科边界模糊，这就严重影响了本学科信心的树立。因此，今后我国该学科的建设需明确研究领域，一方面要坚持各个国家间的比较，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经验为我国所用；另一方面要重视我国的地域特色、优秀的传统文化等，探寻新的学科生长点。其次，我国的比较教育学学者总纠结于比较法是不是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导致无法找准学科定位，影响学科信心的树立。为此，我国学者应明确本学科的建设重点不在于比较法的采用，而在于能否以比较的视野和思维看待国家间、民族间的教育现象。最后，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主要是借用国外理论建设比较教育学学科，没有构建出体现本土文化张力的理论，从而影响学科信心的树立。对此，我国学者应突破以西方为中心的视域，

立足中国立场,提炼本土理论,构建出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理论话语体系,破解“身份危机”。

(二) 扎根中国教育实际,构建独特方法体系

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建设最终要服务于本国教育变革的需要,根植于本国的教育实际是必不可少的。我国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者需自觉摒弃只在书斋中进行文献研究的习惯,以解决中国的教育实际问题为归依,扎根中国生动的教育现场,从实践中挖掘中国教育真正的需求。而面对我国借鉴国外教育经验的方法实质上是单纯的翻译介绍的困境,我国学者还应走进国外教育的现场,真切感受国外教育的实际情况是否如文献所写,以“移情性理解”的方式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对象进行研究,为我国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建设提供宝贵的域外经验。

近年来,学科的建设趋向于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而这也是我国比较教育学学科方法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趋势。比较教育学学科内有多个领域,我国学者应在运用比较法这一基本的方法之下,根据不同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理论框架和实际需要,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来建设本学科。例如,对各国的教育政策、教育法律法规进行比较研究时,以文献法为主;而比较研究各国教育改革的效果,最好采用访谈法、观察法等实证调查方法。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既是中国特色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始终如一的根本立场,更是统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方法体系的哲学基础。^{8[1]}¹⁵⁷一方面,我国学者应善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建设比较教育学学科,发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排斥任何一种具体学科方法论的优势,建立契合中国本土特点的独特方法体系,打破西方比较教育方法论在我国比较教育学领域的主导局面。另一方面,我国学者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视为比较教育学方法论的根基,充分发掘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源,以全面客观的哲学视角来分析教育现象,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比较教育方法体系。

(三) 加强研究队伍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我国应加强比较教育研究队伍的建设,鼓励相关人员设立专攻的方向,以此应对我国该学科建设队伍人员构成复杂,不够专业化的困境。第一,要有一个在比较视野下进行的专攻国别或区域。第二,每个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者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专业基础有一个专攻领域或专题,不能什么热度高就研究什么。第三,还应该有一个专攻的视角。^{9[8]}这是为避免重复对同一个教育现象或事实进行研究,加之一个学者不可能熟悉学科领域内所有的问题。

提升我国比较教育学学科的人才培养质量,就需加强其专业理论素养,充实其实践研究经验。要将理论知识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我国就需安排相关人才系统地学习教育学和比较教育学理论,使其把握比较教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形成运用基本的比较教育理论分析教育问题的习惯。而针对我国比较教育人才缺乏实践研究经验的现象,各高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应加大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投入,提供必要的研究经费和项目支持,将我国相关学者置于真实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实地考察,使其切身体悟研究对象国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背景,彰显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实证魅力。

培养兼具国际化与本土化特点的比较教育人才是我国该学科建设的重要导向。一方面,我国应鼓励相关人才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交流项目,以了解国际上最新的研究动态和前沿理论,确保我国相关人才的培养规范与国际接轨。同时,我国比较教育人才还需以跨民族、跨文化的视野,看待全球共同面临的教育问题,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中公共教育议题的探讨,在国际平台上发出属于中国比较教育的声音。另一方面,我国需鼓励相关人才扎根中国鲜活的本土教育实践,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唤起我国比较教育人才自觉的中国观照,使其将个人学术追求与为本土教育服务的社会责任统一起来,建设独具中国风格的比较教育学学科。

参考文献

- [1] 王建梁, 杨阳.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 动因、逻辑与路径转向[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61(6): 154-161.
- [2] 吴文侃, 杨汉清. 比较教育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2-3.
- [3] 王承绪, 朱勃, 顾明远. 比较教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 17.
- [4] 杨汉清主编; 方形, 王建梁, 欧阳光华副主编. 比较教育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7.
- [5] 王英杰. 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成绩、挑战与对策[J]. 比较教育研究, 2011, (2): 1-4.
- [6] 王英杰. 再谈比较教育学的危机[J]. 比较教育研究, 2007, (3): 7-10.
- [7] 张汝伦. 思考与批判[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9: 126.
- [8] 夏惠贤. 国际视野, 本土行动——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第13届年会综述[J]. 全球教育展望, 2007, (1): 23-30.